



于謙

丁慰長編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于謙

丁慰長編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內 容 介 紹

于謙是明朝时候的一位民族英雄。他年青时已立志“以天下安危为己任”；長成后是个公正廉明、关心人民疾苦的好官；当瓦剌入侵明廷束手無策的时候，他毅然担当起捍衛祖國的重任，組織羣众击退了侵略者。今年是这位偉大愛國者殉难五百周年。本書参考了許多种古代文献，用淺近的文字扼要的敘述了他光輝的一生。于謙是杭州人，他的坟墓在西湖边三台山，古人有“賴有岳于双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之句，于謙的悲壯事蹟为美丽的湖山增添了光彩。

于 謙

丁慰長編著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万石里1号

浙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

地方國營杭州印刷厂印刷·新華書

✱

開本787×1092耗 $1/32$ 印張 $1\frac{1}{4}$

1957年7月第一

1957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5,080

統一書号：11103·6

定 价：(6)一角二分

大憲官上詩書君坐相
悅之樂踴躍西日吟既
乘風石知衷情發於

翰墨也

物書



臣于謙奉



登馬耳巔望龍山瑞雲寺
驛一樹繞溪石城居日觀
龍影花風送故鄉
弘治壬午春
于謙

于謙墨迹之二

目 次

- 一 少年时代..... (1)
- 二 公正廉明的“于青天” (5)
- 三 瓦剌的南侵..... (9)
- 四 保衛京城..... (13)
- 五 整飭边防..... (22)
- 六 遇害..... (31)

“千鎚萬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這是明代衛國英雄于謙少年時代在富陽山中讀書看到石灰窯而寫的一首詩。

于謙是明代中葉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他年青時就已具有不平凡的抱負和堅定的鬥爭意志，從這首詠石灰詩里就可以看得出來。當他巡撫河南、山西時，正當明朝統治者腐朽昏庸、閹黨專權、政治非常黑暗的時候，唯有他公正廉明、在政治上採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改良措施，在當時確是不可多得的人物，尤其為後人所稱頌的，是他能夠密切聯系人民，抗御瓦剌，保衛祖國，將明朝從危急的邊沿上挽救出來，制止了外來侵略者的掠奪性的侵犯。他的愛國行動和他所領導的正義鬥爭，符合于當時人民的共同利益，所以得到廣大人民的擁戴和支持，成為中華民族史上偉大的衛國英雄，永遠活在人民的心里。人民為了紀念他，不僅在他的故鄉杭州立有專祠，而且在河北、河南等地也都建有紀念他的廟宇。

他雖然貢獻出了全部力量來完成保衛祖國的艱巨任務，並提出“社稷為重、君為輕”的比較開明的政治主張；由于時代與階級的局限性，他不是沒有缺點，他很多地方仍是从巩固封建統治出發，為朱明王朝效力。但是歷史人物究竟是歷史人物，我們不能超越歷史條件，過苛的要求封建時代里的人物。

一 少年時代

于謙字廷益，浙江錢塘（今杭州）人。生于明朝洪武三十一

年（一三九八）。他的祖父名文，在洪武初年，曾做过工部主事。父親名仁，字彥昭，沒有做过官，为人正直，生活勤儉。对和尚道士从不輕易布施；对貧苦的人却能尽力帮助不稍吝嗇。

于謙从小就很聪明，讀書非常用功，七八歲的时候就有“神童”之称。民間流傳着許多关于他小时候对对子的故事：据说于謙在七歲的时候，有一天他母親將他的短髮梳成兩個小辮子，在到私塾上学去的途中，碰到了和尚蘭古春，蘭古春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人，他虽然早听到人家說于家有一个小孩子既聪明又勤學，但不知究竟如何，既然碰到了，見于謙梳着兩個小辮子，就故意用开玩笑的方式考驗他，出了一个对子道：“牛头喜得生龍角；”于謙听了知道是取笑他，馬上回对道：“狗嘴何能出象牙。”不但对得敏捷，而且帶有諷刺性。蘭古春并不生气，覺得他对答得这样快，是很不容易的，非常詫異。于謙回到家里以后，对母親說：“以后頭髮不要梳兩個髻了，今天有人取笑我。”于是他母親將他的頭髮改梳成三角髻。过了几天，于謙又碰到蘭古春。蘭古春指着他的頭髮笑着說：“三角如鼓架；”他听了又馬上回答：“一秃似擗槌。”这句对子对是对得不坏，但对和尚是太不礼貌了。可是蘭古春毫不动怒，很高兴地跑到私塾里告訴老师说：“于謙这孩子很不錯，應該好好的培养他，將來必然可以为國家做一番事業。”又有一次于謙的父親到私塾里去看老师，兩人談得很投机，不知不觉立談了很久的時間；于謙見父親來了，原來是站在他旁边的，時間久了，就独自回到座位上坐下來讀書。恰巧为他的老师看到，他老师为了要使于謙父親知道他教的学生不錯，故意用責备的口吻出了一句对子叫于謙对，对句是“子坐父立礼乎？”意思是說父親站在这里，兒子管自坐下來，是應該的嗎？于謙即应声对道：“嫂溺叔援权也。”他是引用四書孟子里的話，意思是按平常的礼節說，父親如果站着，兒子是不應該坐的，但我現在是因为讀書，所以要坐着讀，可以不必拘

于一般礼節，正如古書上說男女是授受不親的，但如果嫂嫂跌到水里的时候，做叔叔的不能坐視不救，是一样的道理。他答得又快又好，他的父親和老师听了都非常高兴。

于謙幼年的时候，曾在杭州慶春門附近讀書。这讀書的地方風景是很幽美的，登樓四望，西面可以看到西湖的宝石山、南高峰；南面可以看到紫陽山和吳山；北面眺望得更远，泉亭山等都可以一一看到；这地方后来一直为人所保留，称为“于公讀書樓”。（今慶春街顯真道院中）

于謙的祖父，生平最景仰宋朝忠臣文天祥的为人，在家里供奉了文天祥的遺象。于謙从小受到家里的影响，爱慕文天祥、諸葛亮等古代杰出的人物，做了很多的題咏讚跋，其中文天祥象贊，最为人所称道。

他在十五歲被拔取为錢塘縣孺学的生員。第二年和友人高孟昇等在吳山的三茅觀讀書。他不僅对先秦、兩漢及宋朝苏轼的著作，下了很深的工夫；尤其留心史学，經常和同學們討論：歷史上为什么有些朝代会兴起，有些会敗亡？他不象一般讀書人將全部的精力局限在文字技巧和八股时文上，而是注意怎样才能將所学的發揮出來，对國家有所貢獻，不負所学。他感到唐朝著名政治家陆贄的奏議，是一部很切实用的書，特地將陆贄奏疏手抄了一冊，时常披閱。十六歲的于謙，已經懷抱着“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宏偉志願了。

于謙为生員时，負責視察孺学生員的督学是一个任性而凶暴的人，平时作威作福，对待生員非常嚴厉。有一天到孔庙里祭祀，生員們因不滿意督学平日的作風，故意鬧起事來，督学害怕生員們打他，吓得跌在泮池里。生員們見禍闖大了，都紛紛逃走。于謙想督学平素固然作風欠佳，但既跌到水里，总不能見死不救；便走到池边將督学救起來。不料督学反迁怒于他，以为生員的鬧事和自己的落水，都是于謙的罪。于謙义正辞嚴的回答道：

“你怎么如此不識好歹呢？鬧事的早走了，我是見你快要淹死而來救你的，我希望你以后自愛些才对，不要太任性了，否則又会跌到水里去的。”督學听了非常慚愧。

不久，礼部主事孔原貞到杭州來，在參觀仔學的時候，和生員們說：“你們应着重學習做公文和練習寫字。”于謙听了覺得他說的話不妥当，立即站出來說道：“學做公文和練習寫字，固然是應該做的事，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國家設立學校，主要是为了培养才德兼備的人，不是僅僅局限于办办公文抄抄書牘而已的。”孙原貞知道自己的話講錯了，趕緊向大家道歉，从座位上跑下來，請于謙上坐。从此，孙原貞和于謙竟成了很好的朋友。

于謙于廿四歲中了永乐十九年（一四二一）進士。會試時原來考取第一名，主考楊士奇對他的文章很稱讚；但後來殿試，因文章中直率的指出了當時政治設施中很多不妥当不合理應該改革的地方，致為親貴大臣所忌，將他壓置到三甲九十二名。

由于他有真才實學，中進士后不久，便被任命為御史。永乐廿一年（一四二三）奉命到湖北、貴州一帶犒勞軍隊和招撫僜民、僜民。那時率領軍隊駐守在湖北、貴州一帶的高級軍官，往往濫殺僜、僜等少數民族，來冒功求賞；見于御史到來，做賊心虛，都低声下氣想尽方法拉攏于謙，企圖掩飾罪惡。但于謙毫不徇情，當面揭發了他們這種“邀功妄殺”的罪狀；一面奏請朝廷，將這些不法軍官分別予以處分。

永乐二十二年（一四二四）明成祖在北征韃靼的歸途中病故于榆木川（今內蒙古多倫縣西北）；皇太子高熾即皇帝位，就是明仁宗。這時明朝的統治已日趨穩固，所以仁宗的一些設施都趨向保守，比嚴酷凶暴的成祖要緩和一些。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即死去，他的長子瞻基即位，改元宣德，是為明宣宗。

于謙軀干魁偉，聲音洪亮，說話很有條理。有一次在奏對的時候，宣宗非常讚美他的發言；以後一些重要的詔旨，常叫他宣

讀。

于謙在都察院任职时，都察院里的長官顧佐是一个很嚴厉而自負的人，平时对同僚下屬，很少称讚；独独对于謙非常重視，認為自己的才能不及于謙。

二 公正廉明的“于青天”

宣德二年（一四二七）于謙三十歲，因都御史顧佐的荐举，巡撫江西。

在明朝統治階級逐漸腐朽的情況下，政治黑暗，人民痛苦加重，地方官吏魚肉百姓，以民命為兒戲。江西更為嚴重，南昌的監牢里就關着好幾百無辜的百姓。加以南昌封有藩王，王府中的官員尤其橫行不法，出來購買東西，總是拿出極少數的錢，買價值數倍以上的貨物，這種名義上購買實際上等於強搶的事，常有發生。一般官吏既同流合污，又懼怕王府勢力，都不敢干涉；因之，這些王府官屬益發無法無天，使得王府附近的店家、攤販們無處伸冤。

于謙到了江西之後，先將以前判決的案子逐一分析，重新經過仔細的調查，把被冤屈的百姓，都釋放出獄；應該從輕判罪而從前判成重罪的，都予以減刑。于謙知道藩王府中那些橫行不法的官屬，是非常狡猾的，所以他初到時一點不動聲色，過了一個時期，証據確鑿了，乃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這些為首的壞分子逮捕，加以嚴厲的處分。經過他這樣的一番整頓，貴族、奸吏的凶焰，才漸漸低下去，不敢過分的胡作非為了。

于謙在江西，不避權貴，敢說敢做，凡是对老百姓有害的弊政，他总是盡力設法改革。所以他在江西的時間，雖不過短短的一年，但江西人民對他非常愛戴，在他將離開江西回到北京的時候，他們為于謙設立了長生祿位，供到郡學的名宦祠中，表示敬

意。

宣德五年（一四三〇）河南和山西發生旱災，災情非常嚴重，朝中諸大臣商議，應調才德兼備的人前往任職。宣宗知道非于謙去不可，親筆寫了于謙的名字給吏部，超陞他為兵部右侍郎兼巡撫河南山西都御史，這時于謙僅三十三歲。

他的職位已很高了，而他的生活仍很朴素，不改原來書生本色。他從北京往河南上任時，行李非常簡單，坐的是騾驢，不知道他的人，決不會猜想到他是一位新上任的巡撫。

他到任之後，馬上親自下鄉，訪問老百姓，問他們對哪些措施感到不方便，哪些法令認為不妥當？不妥當和不方便的，盡量設法革除和改良。

他到了災區首先感到詫異的是河南、山西的災情這樣嚴重，老百姓沒有飯吃，餓死的很多，而官吏們高高在上，倉庫里的糧食，有些已堆積到六、七年以上的，一粒也不拿出來救濟災民。他眼見這種情形，非常痛心，就趕緊下命令給各縣，將存放在倉庫中暫時不用的銀錢、糧米，無條件的分發給災情嚴重的災民；災情較輕的地方，則降低糧價，發售給災民。一面勸告百姓，平時應多預備一些谷子以防荒年。他預見到災荒之後，疾病一定很多，尤其是時疫痢疾會廣泛流行，特地設立了惠民藥局，使百姓們得到醫療和領藥的方便。

為了防止黃河的泛濫成災，他動員羣眾在種田空隙的時候，將旧的堤障筑厚加寬。堤上種植了榆樹和柳樹，既可以使堤障更加牢固，又可以給行路的人遮蔭乘涼。每十里路開一口井，便于行路的人飲水解渴。每隔五里建一個亭子，每個亭設立一個亭長，專門負責修補堤障的工作。

他認為邊塞將官強占了很多田地作為私產是不合理的，當收歸國家所有，作為補充邊疆防守的費用。這時朝廷上三楊當國，政治比較清明，所以于謙提出的措施，大部分得到推行。

他对待百姓象自己家里人一样，凡是民間有冤屈的事，准許直接到巡撫衙門申訴，他必然立即为百姓处理。有人說：“你是‘節鉞重臣’，連百姓的这些瑣雜事情也要管，不是有喪尊嚴了嗎？”他笑道：“做巡撫主要是使下面的情况能够上达，不接近百姓，下面的情况怎样能知道呢？如果不体察下情，为百姓所咒罵，才是有喪尊嚴的事。”

于謙一系列的作为，是符合于当时人民的要求的，所以深受河南、山西人民的爱戴，称他为“于青天”、“于龍圖”，比之于宋朝妇孺皆知的清官包拯。

明宣宗于宣德十年（一四三五）死去，太子祁鎮即位，是为英宗，改元正統。这时三楊已相繼去世了；太監王振用事，勾結内外官僚，擅作威福。英宗即位时僅九歲，什么也不懂，政权便逐漸为王振所把持。原來明太祖害怕自己的子孙不爭气，独裁政权会被宦官所把持，在宮門內特制“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干預者斬”的鉄牌，也为王振毀掉。百官凡是触犯了他，必遭到毒手。当时一般不知廉恥的貴族和大臣，很多喊王振为“翁父”，甚至見了王振行跪拜礼。在王振当权的几年中，將明朝政治推送到黑暗的極峯，他的爪牙遍布全國，官場的風气越來越坏，地方行政也更加混乱，公然行賄索賂，恬不为怪。

于謙是个清廉勤政有气節的疆臣，他如何肯卑鄙無恥地去奉迎宦官、結納親貴大臣呢？虽然因公时常入京奏事，不但不肯对王振稍假辞色，而且碰到意見不投时，总是据理力爭，毫不迁就。每次入京，依然和以往一样，除了簡單的行李之外，从不攜帶送人的礼物。有人对他說：“你即使不帶金銀到北京，也应该帶一些土產送人，作为交际品。”于謙笑着举起他的袖子道：

“我入朝怎么沒有帶东西呢，不是有兩袖的清風嗎？”并口占了一首詩以見志：“手帕磨姑及綫香，本資民用反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鄉閭話短長。”这首詩載于明朝人郎瑛所著七修类

稿，后来有人認為句子太俚俗，不一定为于謙所作，虽然这是一个疑問，但是口占的詩是不同于細細推敲的，况且意思也很好。

由于于謙的声望与日俱增，每次入京总是“空囊以入，無私饋謁”，对王振和一些腐敗的親貴官僚从不屈服，当然遭到了王振等的妒忌与不滿，想謀害他。適逢正統六年（一四四一）三月，于謙到北京奏事，并荐举参政王來和孙原貞二人的才能出众，可以代他为巡撫。王振就唆使走狗通政使李錫，誣劾于謙，說他“因为長久得不到迁陞，心怀怨望，所以上書擅自举人自代，做臣子这样提出，太不礼貌了，應該判以死罪。”于謙遂被陷下獄，关了三个月。河南、山西的百姓，听到于謙下獄的消息，都紛紛赶到北京，要求釋放于謙。王振虽然專橫，也知众怒难犯，只好將于謙釋放，降为大理寺少卿，假惺惺的說：“我以前因为看到一个姓名和于謙相类似的御史，太恣橫了，要治他的罪，誤以为就是于謙，錯將他关到監獄中，現在我才記起來，于謙的罪是不大的。”可是河南、山西的百姓仍然不够滿意，又集合了一万多人，伏闕上書，請求仍命于謙巡撫河南、山西；同时河南、山西的藩王周王、晉王，也向明廷提出要求，明廷乃命于謙仍回原任。

这一年，陝西、山东都發生了旱災，很多的百姓流离失所。这些災民因素知于謙爱护百姓，就有二十多万人迁移到河南、山西來。于謙對他們的关怀，和对河南、山西百姓一样，叫各縣邑分配田和耕牛給他們从事生產；暫時不收他們的稅，直到生活較為安定，再繳納归还。

正統十二年（一四四七）于謙的父親在錢塘病故，他向英宗提出回家終制的請求。英宗不許，只答应他很短的假期，所以他回杭安葬父親之后，即匆匆回到北京。这时兵部尚書是鄭瑄，虽然人尚干練，但年紀大了，精力不足，魄力也不够；英宗乃任命于謙为兵部左侍郎，留在北京，帮助兵部尚書鄭瑄管理兵部的事

务。

在于謙任兵部左侍郎的第二年，北方的瓦剌部族突然在七月間大举南侵，英宗听了王振的話，率兵北征，造成了歷史上可恥的“土木之变”。

三 瓦剌的南侵

瓦剌是蒙古族的一支。蒙古部族在蒙古高原上大致分为三大部：东面是兀良哈諸部；居中的是韃靼諸部；瓦剌部族則是在西面的一个部落。这些部族不僅常常發生內爭，自相仇殺，也时常侵擾明朝的边疆。

原來韃靼最强，由于屡次擾犯中國的边境，被明軍打敗，勢力漸漸衰弱，于是瓦剌起而代替了他，成为蒙古各部族中足以左右一切的部落了。

永乐十五年（一四一七）瓦剌首領馬哈木去世，兒子脫欢襲位，它的勢力已伸展到巴尔喀什湖以南吉尔吉斯草原一帶了。宣德九年（一四三四）脫欢又攻殺了阿魯台及阿台吉汗，把韃靼和瓦剌兩大部落統一起來。他本來想自称可汗，但各部的意見不一致，只好暫時拥立元朝皇帝的后裔脫脫不花做可汗，自己称丞相，掌握了軍政大权，僅讓脫脫不花領有阿魯台的余部。

脫欢为了更進一步向南發展，在征服开平（今內蒙古多倫縣境）以北的哈喇噶斯时及亦集等牧地以后，再進擾甘州（今甘肅張掖縣）、涼州（今甘肅武威縣），嚴重地威脅了明朝的北方边疆。

正統四年（一四三九）脫欢去世，兒子也先嗣位，他比脫欢更凶暴更專橫，侵略的野心也更大。他自称为太师淮王，表面上虽將可汗的名義仍加在脫脫不花的身上，实际上蒙古高原各部落已完全在也先統屬之下了。也先繼續不斷的侵略并吞附近各部落，

不到四五年，他的疆域已西起中亞細亞，東接朝鮮，北連西伯利亞南端，南鄰明朝的邊境，造成元朝以後最大的蒙古汗國。

瓦剌表面上每年都派遣使臣到明朝來“進貢”，所謂“進貢”，實際上是騙取明朝財物的一種手段。瓦剌既然進貢，可以在派遣使臣的同時，多派隨從人員，要求多領賞品；而明朝也必然派遣使臣往瓦剌去報答，賜送許多的禮物；以及允許在中國開放馬市，讓瓦剌用馬、騾、牛、羊、駱駝、毛皮、馬尾等物和明朝交換緞、絹、紬、布等他們缺少的東西。

瓦剌由於對明朝內部的實力，還沒有得到明確的估計，所以一時還不敢明目張膽的向明朝侵略，但暗中对中國的侵略計劃是無時不在進行中的。瓦剌不僅以貢馬的方式，向明朝換取大量的金銀與緞絹，還和王振以及王振的黨羽勾結，從走私中獲得大批需要的物資和武器。例如王振的爪牙大同鎮守太監郭敬，每年私造鋼鐵箭鏃數十甕，用王振的名義送給瓦剌，瓦剌就派人送給王振良馬；同時瓦剌派到北京的貢使，每年達二三千人之多，都大量購買弓箭，夾藏在衣箱里出塞。當時宣大巡撫羅亨信，曾奏請在居庸關對瓦剌貢使進行檢查，以便扣留武器，由於王振的包庇，明廷竟不許關吏檢查瓦剌貢使與隨從人員攜帶出關的行李。

瓦剌成為明朝最危險的敵人，已經很明顯了。可是，明朝對蒙古的防禦，從宣德以來，很少有積極的措施；正統時更陷入消極防禦的地步。王振粉飾太平，對瓦剌派來的貢使，仍厚加招待。以前在洪武、永樂年間，瓦剌貢使員額，每年不過五十多人；到了正統時，驟增至二千多人，且往來多行殺掠，邀索中國貴重難得的物資，稍有不遂，即起爭端。大同邊鎮上對貢使的供應，每年用銀達三十萬兩，巡撫盧睿、戶部侍郎劉中敷等都為了來不及籌備這筆龐大的費用而受到辦事不力的罪名，下了牢獄。但是並沒有滿足貢使們的慾望，他們在塞內劫掠挑衅的行動仍時常發生，也因王振的庇護，守邊將士不敢干涉。

正統十四年（一四四六年），也先積極筹备大規模進攻明朝的步驟，基本上已就緒。于是在这年春天，开始向明朝挑衅；派使臣二千多人到北京貢馬，号称三千人，企圖冒領賞品，偏偏平日对瓦剌一切采取縱容态度的王振，这次却又輕意調弄，命令礼部按照貢使的实际人数發給賞品，又減去馬价五分之四。也先大怒，就借口明朝侮辱瓦剌使臣，随卽派兵大举南侵，分兵四路，也先親率所部進攻大同。明朝慌忙应战，七月十一日，明參將吳浩于大同北面的猫兒庄（今山西陽高縣西）兵敗战死。明廷繼續派駙馬都尉井源等率領四万多騎兵出击，結果又全軍复沒。

在边报緊急时，王振因自己是蔚州（今山西蔚縣）人，蔚州靠近大同，他唯恐家鄉受到瓦剌軍的侵擾，同时又想在北方顯耀武力，增加自己的威势，劝英宗親自北征。英宗听信了王振的話，不顧于謙和兵部尙書鄺埜等極力劝阻，下令卽日出兵。

明朝这次的出兵，在事前毫無作战准备，又不听于謙等的忠告，只想拿“親征”的名义去吓退敌人；加以实际上的統帥王振，既毫無軍事才能，又剛愎自用，战争的后果，自然注定要失败的。

七月十六日，英宗与王振率領軍隊五十余万人，倉卒从北京出發。大臣如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戶部尙書王佐、兵部尙書鄺埜等，都随从皇帝車駕北征，英宗叫于謙留在北京，代理兵部的事务。八月一日，大軍到达大同，適逢大風雨，軍士們飢寒交迫，苦不堪言。戶部尙書王佐一再請求英宗回軍，被王振叱罵。直到前方軍隊战敗，城邑陷落的消息不斷傳來，王振才知道事情的嚴重，下令退兵。在退兵的时候，王振又異想天开，要邀請皇帝到他家轉一下，以夸耀鄉里，便指揮大軍迂道向蔚州進發。可是軍隊才走了四十多里，又忽然变卦，恐怕人馬这样多，經過蔚州，会踏坏自己田里的庄稼，复勒令軍隊循原路走向宣府（今河北宣化縣）。初十日到达宣府，得到敵軍已逼近的消息，